

科学发展观

简明教程

KE
XUE
FA
ZHAN
GUAN
JIAN
MING
JIAO
— CHENG

袁准 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科学发展观简明教程

主 编 袁 准

副主编 章正爱 曹健华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王 琪
封面设计 卜艳冰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马 晶
责任印刷 宋二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学发展观简明教程/袁准主编. —北京: 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 2006.6

ISBN 7-5035-3490-7

I. 科… II. 袁… III. 社会发展—中国—党校—
教材 IV.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3026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6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井岗印刷厂印刷装订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298 千字

定价: 24.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	1
一	经济增长发展观.....	1
二	社会综合发展观.....	7
三	可持续发展观.....	15
四	科学的发展观.....	23
第二章	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	30
一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世界背景.....	30
二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国内背景.....	39
三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党内背景.....	49
第三章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地位	60
一	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60
二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69
三	马克思主义发展新成果.....	80
第四章	发展中心观	92
一	解决中国所有问题要靠发展.....	92
二	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04
三	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	110

第五章 人本发展论	119
一 满足人民的多种需求.....	119
二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27
三 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	137
第六章 全面发展观	146
一 全面发展是重要的战略举措.....	146
二 把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153
三 全面推进“三个文明”建设.....	160
第七章 协调发展观	173
一 坚持非平衡与相对平衡相统一.....	173
二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相协调.....	181
三 统筹兼顾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	188
第八章 持续发展观	200
一 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00
二 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07
三 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16
第九章 和平发展观	227
一 和平发展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227
二 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	236
三 实现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43
第十章 发展动力观	253
一 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	253

二 开放是发展的外在动力·····	262
三 科技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270
第十一章 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279
一 科学发展观与正确的政绩观·····	279
二 科学发展观与正确的人才观·····	288
三 科学发展观与正确的群众观·····	296
第十二章 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途径·····	306
一 更新发展观念, 提高发展质量·····	306
二 转变政府职能, 规范政府行为·····	311
三 突出工作重点, 解决实际问题·····	317
第十三章 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	333
一 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至关紧要·····	333
二 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存在的体制 性障碍·····	340
三 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体制和机制创新·····	349
后 记·····	361

第一章 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社会发展确立正确的目标和道路，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虽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但是人们对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战略的制定，影响着发展道路的选择。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观，将严重影响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正确的发展观将有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错误的或片面的发展观将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因此，发展观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依据人们对发展本质的不同理解，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论经历了一个从片面的经济增长发展观到社会综合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观，再到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演进过程。

一、经济增长发展观

经济增长发展观或工业文明的发展观，是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或仅仅追求经济增长的一种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源于“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的兴起。

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渊源可上溯到亚当·斯密。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是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

重要著作，也是探讨经济发展的最早著作。该书关注的中心是国民财富问题，讨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国民财富增长（即扩大商品生产）的条件，分析了促进或阻碍财富增长的原因等。斯密将经济发展的目标定义为促进国民财富的自然增长，并将国民财富的来源归结为增加资本的数量、改善资本的用途以及提高专业化分工程度等几个方面。由于他特别强调市场竞争和专业化分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此主张自由放任，鼓励市场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由于斯密将经济发展理解为一种通过自由市场来有效配置资源进而实现财富增长的过程，因而其发展思想可以看成是增长发展观的思想源头与理论雏形，而其后的不少理论拓展即由此开始。其中的一个拓展方向就是把市场竞争的功能加以形式化，进而形成了一系列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与模型；而另一个拓展方向则沿着专业化分工的路线演进，形成了以专业化分工和演化经济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①。增长发展观一般被看成是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典型代表，由于它过分强调经济增长本身，而对发展所包含的其他方面的内容重视不够，因此必然会产生诸多问题，这样，不仅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推进，而且也会产生其他方面的许多不良后果，像“无工作的增长”、“无声的增长”、“无情的增长”、“无根的增长”以及“无未来的增长”等“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便最具代表性^②。这也正是后来的物兼顾人的发展观得以产生与流行的重要原因，其中佩鲁的综合发展观和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 L. R. 布朗提出“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则是主要代表。

在斯密之后从事经济发展研究的西方经济学家为数众多，不少人对发展经济学做出了贡献。其中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二元

① 汤敏等：《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1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3页。

② 郭熙保：《论发展观的演变》，《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

经济理论”的创立者威廉·阿瑟·刘易斯、“人力资本和教育”理论的创立者西奥多·舒尔茨、对经济、社会和体制现象的相互关系作出创造性阐述的纳纳·缪达尔，由于他们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贡献，分别于1979年和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发展经济学及其理论主张的产生来看，它是适应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产生和形成的。当时，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为了振兴本国经济，消除贫困，重新确立本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纷纷开始探索本国的发展道路。而战后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力的现实问题。发展问题成为人类社会在20世纪下半叶面临的共同焦点，于是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它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即所谓“欠发达国家”如何才能从贫穷落后状态，发展为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现代化经济，研究发展的具体过程和条件，以及为实现经济增长应制定的政策和战略。因此，发展经济学根据对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认为只有促进经济增长，落后国家才能实现追赶的目标。

虽然发展经济学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之上，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由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组成的西方经济学原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分析市场经济、国民收入和就业理论，偏重于中、短期的经济研究，对人口和技术因素一般都看成是既定的外生变量，涉及到增长理论时才进行长期分析。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经济增长理论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人口的增长和技术引进问题则是它讨论的重点之一。其次，发展经济学强调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特点，注重个案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虽然可以

应用于各个发展中国家,但是由于国家众多,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不针对各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就很难制定出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合适的政策。因此,发展经济学注重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有关这方面的著作相当丰富。例如,普雷维什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研究了拉丁美洲各国对外贸易的历史和现状,才提出后来被称为进口替代的战略。个别国家如马来西亚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情况,发展经济学家对它也有详尽的分析。

综观发展经济学理论,其基本观点主要有: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内容;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实现工业化和实行追赶战略的重要手段。如“二元经济理论”或“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学说”的创立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商业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由他们的边际收益率决定的,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只可能保持在极低的水平上。现代工商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职工工资收入大大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将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一方面会提高这部分转移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会增加现代工业部门的产出和积累;反过来,现代工业部门积累增加使它有能力和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到本部门就业。由这种互动关系造成的良性循环,会促使整个经济加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过渡到刘易斯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①。为了加速过渡到“现代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优先考虑如何

^① 威廉·阿瑟·刘易斯:《经济成长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尽可能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显然这一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极具适用性。

这种单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在 50~60 年代盛行全球，并受到刚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政治家、学者和当时许多国际组织的赞同和支持。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在战后 50 多年的时间里，人类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评价与诊断的重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形成了以 GDP 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理念。认为经济增长是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体现，是国民生活幸福的象征；“大功率”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民主化，它是公平分配的物质前提；贫困国家通过经济增长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消除贫困现象。

虽然发展经济学曾经在西方经济学界红极一时，是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激动人心的领域之一，他们热衷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独立自主地实现本国的工业化，热衷于讨论如何制定经济发展计划。但是，由于本身条件的限制，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工业化发展计划的效果不太理想，实践结果也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由于经济增长并不能体现收入分配的改善和社会结构的完善，不能反映技术进步的变化，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福祉，相反，却出现了高增长下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道德失范、能源浪费、暴力猖獗、政治动荡、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在发达国家也面临着诸如“社会病”、“心态病”等等社会问题。特别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向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挑战，使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非难和否定。有人甚至对发展经济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也产生了怀疑，这充分暴露出西方发展经济学倡导的经济增长发展理论本身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经济发展观是一种非理性的发展观，对发展的内涵认识和发展问题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一些非理性的思想倾向：一是非全面性。它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片面强调发展的经济目标、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总量，不太注重甚至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实际效果。认为只要提高经济增长率，社会财富就会自然增长，经济会自然发展起来。在这种发展观念的引导下，把发展问题单纯看成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把资源、环境问题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或外部环境。于是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在不自觉中违背自然运动规律，导致人类和自然两败俱伤的严重后果，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是非协调性。传统发展观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为出发点，主张人类在经济行为的选择时重点考虑当前可以预期到的直接经济后果，而不涉及或忽视长期的不可预期到的未来经济后果。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建立在人的价值基础上，只承认人类利益，而忽视自然以及其他物种的利益。实用主义经济伦理则把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视为经济活动的价值判断，并以这种价值判断作为标准引导人类生产活动。其局限性只考虑眼前的功利与实用，不顾及人类的长远利益。为了发展经济，人们不顾一切地掠夺资源，使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目标建立在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基础上。建立在这种发展观基础上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以为只需要将“经济馅饼”做大，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这种发展观的支配之下经济增长中的负面效应日益扩大，企业在生产产品的同时，毫不顾忌地浪费资源，边生产边污染，好处留给自己，坏处转嫁给社会。由此产生了被经济学上称之为“外部性”的现象。

经济发展观从理论和认识上没有把“发展”与“增长”区别开来，认为“发展=经济增长”。实际上发展不应当狭义地被理解为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一般定义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有时也看作是人均实际消费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必要

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一种经济增长如果随时间推移不断地使人均实际收入提高却没有使得它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得到进步，就不能认为它是发展。发展的目的是要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发展指人们福利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或实际收入的增长），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一部分。低收入国家急需经济增长来促进生活质量的改善，但这不是全部目的，也不可能无限地继续下去。发展只有在使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得到改善才能承认是真正的发展。

通常来说，发展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经济因素，即要求效益超过成本，或至少与成本平衡；二是社会因素，要求不违反基于传统、伦理、宗教、习惯等所形成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社会准则，即必须保持在社会反对改变的忍耐力之内；三是生态因素，要求保持好各种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等生命支持系统以及有关过程的动态平衡。其中生态因素的限制是最基本的。发展必须以保护自然为基础，它必须保护世界自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多样性。基于此，人类发展观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进行变革。

二、社会综合发展观

20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全球人口剧增、食物匮乏、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大量失业、社会两极分化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涌现，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受到了严峻挑战，促使人们开始对传统的以 GDP 增长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行反思，促使发展经济学家针对这些失调现象，加强了分析研究，推进了理论发展。人们逐渐从异化的物质财富增长中解脱出来，把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人的自由的拓展和人的能力的发展上，逐步从更宽的

视野去审视发展，逐步认识到忽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带来人们所期望的普遍福利。发展应该以人为中心，发展的目的是消除贫困，扩大就业，普遍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全体成员分享发展成果的社会全面进步。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发展观及其支配下的发展方式可以说是造成今天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和矛盾的最根深蒂固的原因。面对现实，人类首先应该做的工作便是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反思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实践证明，单纯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是不全面、不科学的。而要解决上述全球性问题，只是制定更多的法律、制度、对策、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真正从深层把握这些问题的价值底蕴，彻底改变人类传统的思维方式，建立和确认新的价值准则、行动规范、伦理道德，才能应付全球问题的挑战，把人类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1949年，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推出了《生存之路》一书，成为继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之后再次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和生存问题注意的理论著作。他从大地伦理和环境道德观或环境价值观的角度，提出了一套人类生存哲学。如：“我们——全体男女老幼必须重新调整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应该重写我们的哲学，使它脱离论争和‘观念’的领域，而在大地上牢牢生根”，“人类肩负责任的重要性不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生物物理难题不可分割地也是个伦理问题”^①。

丹尼斯·古雷特则从以人的基本需求为中心的角度认为，发展至少有三个内容：生存、自尊和自由。所谓生存，就是提供基本生活需要，包括实物、住所、健康和保护，以维持人的生存。当这些基本需要中的任何一项得不到满足或严重匮乏时，就意味着存在“绝对不发达”的状况。没有在社会水平和个人水平上持

^① 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9页。

续不断的社会进步，人力资源及其潜能就很难得以发挥。因此，要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就必须提高人均收入，根除绝对贫困，增加就业机会和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所谓自尊，是指人要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要人人能感受到自身价值的自尊感，而不是为了他人的目的被作为工具来使用。自尊的性质和形式可能因为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而发生变化。目前，人们常常把社会的繁荣和物质财富作为实现自尊的基本形式和一般价值尺度。所谓自由，就是把人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从种种惯例和教条主义信仰的社会奴役下解放出来。自由还意味着社会及其成员选择范围的扩大，或者限制范围的缩小。刘易斯在强调经济增长与从奴役下取得自由之间的关系时断定：“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在于财富造成的幸福的生长，而在于它扩大了人类选择的范围。”财富可以使人获得在面对贫困时对自然界和周围环境更大的控制能力，可以使人换取更多的闲暇，得到更多的物质产品和服务。

然而最终促使人类大反思的机会，却是一系列充满死亡气息的公害事件，它们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存：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宾州多诺拉烟雾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5年开始的日本富士山县骨痛病事件……这些动辄令大面积患病甚至死亡的环境事件，成为“自然界的报复”，冲击着一味掠夺自然进而破坏环境的片面发展模式。1962年，一本读后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登上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这本由美国女生物学家瑞秋·卡森撰写的《寂静的春天》，并非什么惊悚小说，而是论述杀虫剂，特别是滴滴涕对鸟类和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危害的科普著作。书中写道：“森林里不再有鸟儿的歌唱，河流不再有游动的鱼儿……”原本草长莺飞、水绿鱼跃的春天突然失去了勃勃生机，变得一片死寂。其祸首就在于包括滴滴涕在内的杀虫剂的滥用。这些性质稳定极难分解的化学发明，在杀死了害虫的同时，也毒死了以害虫为食物的

鸟儿；土壤中的杀虫剂通过地面径流进入河流、海洋，也夺去了许多游鱼的生命。《寂静的春天》清楚地昭示人们，对大自然的傲慢无知将导致难以治愈的伤痛。此书的问世，虽给作者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发展必须顾及环境问题的思维，却从此根深蒂固地走进了全球政治、经济议程的中心^①。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人们对发展有了更新的认识，认为把经济产值的增长作为最高追求目标的结果是：经济增长了，而环境被破坏了，社会问题也增多了，而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反过来又严重地制约经济发展。所以，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单纯用“经济指标”并不能准确反映社会的发展水平。于是人们开始寻求一种能够全面衡量和监测社会发展水平的新方法，由此“社会指标”和由社会指标构成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便应运而生了。在上述背景下，一种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目的的“社会指标运动”于 60 年代首先兴起于美国，其所建立的各种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亦得到不少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美国宾州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理查德·J. 埃斯蒂思的由 36 个指标组成的“社会进步指数”；美国海外开发署的大卫·莫里斯博士的生活质量指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除了上述影响较大的几种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之外，前苏联、罗马尼亚、日本、法国等也都建立和公布了自己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到 1972 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发表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更使世人认识到人口、粮食、资源、环境和工业增长等问题已构成了相互联系的全球性危机，从而引起了全人类的广泛

^① 《人民日报》2005 年 5 月 26 日。

关注和重视。1968年,正当工业国家陶醉于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随之而来的“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时,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约30位企业家和学者聚集在罗马,共同探讨了关系全人类发展前途的人口、资源、粮食、环境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并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这批人士的聚会后来被称为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是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被称为“无形的学院”。其宗旨是要促进人们对全球系统各部分——经济的、自然的、政治的、社会的组成部分的认识,促进制定新政策和行动。经过努力,罗马俱乐部的研究小组考察了最终决定和限制我们星球增长的基本因素,并出版了一份研究成果——《增长的极限》。《增长的极限》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教授等撰写的,是他们集体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其主导思想从该书的副书名“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上一目了然。全书分为“指数增长的本质”、“指数增长的极限”、“世界系统中的增长”、“技术和增长的极限”、“全球均衡状态”五章,从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几个方面阐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书中以各种数据和图表有力地证明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使人类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并将会继续不断受到自然的报复。该书还指出“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而且,“为达到这种结果而开始工作得愈快,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零增长”是罗马俱乐部发展观的核心。尽管理论界对此仍有争议,有人甚至写过一本《没有极限的增长》来进行反驳,但这本书仍可以说是人类对高生产、高消耗、高消费、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首次认真反思,它的论证为后来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增长的极限》和罗马俱乐部一起成为环境保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